

日本帝國保障占領下北樺太亞港的流離再現 —大鹿卓小說〈夜霧〉書寫的時代意涵—

劉淑如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大鹿卓寫於戰前的小說〈夜霧〉為對象，考察文本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保障占領地北樺太亞港的流離經驗之再現，並思考小說書寫的時代意涵，進而趨近大鹿卓文學的本質。結果顯示，橫跨西伯利亞出兵與日中戰爭的時代背景的〈夜霧〉最主要的訴求為傳達厭戰之思想。過程中作者以深具地政學意涵的都市—亞港為例，呈現出帝國主義下勞力、技術、資本跨界／國流動的現代政經及多民族景觀，並勾勒出戰時下失所流離者的失／離鄉經驗，以及這些失／離鄉的「命運共同體」所匯聚的城市之充滿臨時與浮動的意象。儘管如此，作者並無意關心真正的底層，同時也隱蔽了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在本質上為一對外侵略的軍事行動之事實，而此種對俄人在性別、種族及階級上的壓迫，也成為小說的另一個鮮明的主張。

大鹿卓的戰前小說大多深刻關心前往海外的日本人在異地的適應問題，以及其如何透過在異地的生活實踐，思考並呼應國家政策。同時，作者向來以日本人及男性為主體的書寫策略，往往令其小說招致在人道主義上的根本懷疑與未脫種族主義框架的評價。據此，〈夜霧〉可視為上述作品之延長。另外，小說書寫於言論受限的年代，此時日本也被國際社會所孤立。故就小說的選題、架構與修辭等面向，以及小說呈現的封閉的日本對外戰爭史觀的角度而言，小說不僅與十五年戰爭期間的日本精神史的動向緊密連動，也充份反映出當時日本在國際上的艱難處境。尤其，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相關研究在戰前乃被視為禁忌，這使得〈夜霧〉在戰前乃至戰後始終未受到日本文壇的關注。然而，戰爭與人流的問題未曾消逝，是而本文最後也指出，傳達厭戰思想的〈夜霧〉時至今日依然具有時代性意涵，值得被關注。

關鍵字：北樺太、流離、〈夜霧〉、西伯利亞出兵、日中戰爭

受理日期：2017.03.10

通過日期：2017.05.05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splaced in Akou, North Sakhalin
under the Japanese “Protective Occupation”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mperial Period in Ooshika Taku’s
*Yogiri***

Liu Shu-J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Focusing on Ooshika Taku’s Karahuto novel *Yogiri* (Night Fog), this paper examines representations of those displaced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consider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eriod the novel was written, and analyzes some literary qualities of Ooshika’s writing.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ambition of *Yogiri*, a story tol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oops dispatched to Siberi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s to convey a sense of war-weariness.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this, Ooshika uses the city (in its geopolitical sense) as a means to trace how labor, technology, and capital flow across nations and borders under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ultiethnic landscape of modern imperialism. The author outlines the wartime experiences of people who leave their homes, those who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and those whose communal fate is to live in cities full of frivolous images. Nevertheless, the author shows no real concern for subalter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verlooking the fact that Japan’s sending of troops to Siberia was obviously a military invasion. The gender, racial, and class oppression of the Russians is another clearly stated position in the novel.

Most of Ooshika’s prewar novels were deeply concerned with problems Japanese people faced while adapting to living abroad, and how through that process they came to think about and respond to Japanese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invariably wr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le Japanese subject, which leads to a fundamental skepticism about any humanitarian claims and makes it necessary to view these novels as having a racist framework. In this sense, *Yogiri*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of his previous work. Also, the novel was written during a period in which speech was proscribed and Japan was iso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sequently, aspects of the text such as its topic, structure, prose, and its insular view of Japanese foreign aggression link the novel not only to 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pirit” during the Fifteen-Year War, but also fully reflect the international difficulties Japan faced at the time. Writing about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Siberia was considered especially taboo, which meant that *Yogiri* received no attention from the Japanese literary world before and even after the war. The problems of war and human displacement have not disappeared, and a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essage of war-weariness in *Yogiri* is still relevant today and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Keywords: North Sakhalin , Displacement, *Yogiri*, Siberian invasion, Sino-Japanese War

日本帝国保障占領下北樺太亜港の流離表象 —大鹿卓小説「夜霧」の時代的意義—

劉淑如

国立宜蘭大学外国語文学学科兼任助理教授

要旨

本稿は大鹿卓の小説「夜霧」を対象に、テキストの中の日本帝国保障占領下北樺太亜港の流離の表象を考察し、小説の時代的意義を考え、さらに大鹿卓文学の本質を明らかにする。結果として、シベリア出兵と日中戦争の時代に跨る「夜霧」の中心的趣旨は厭戦の思想に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作者は作品で主に地政学的意味が深い町一亜港を例に、帝国主義下における労働力、技術、資本の越境する現代的な政治と経済並びに民族的景観を呈しており、戦時下の流離者の、故郷を失わざるを得ない／離れざるを得ない経験と、それらの流離者の集まる町に溢れている軽薄なイメージをも浮き彫りにしている。また、作者は本当の社会的低層には無関心だと言え、また日本のシベリア出兵は本質的には対外侵略の軍事行動であるという事実をも隠蔽している。そしてこうしたロシア人への性差別、階級と種族的な圧迫もそこで小説のもう一つの鮮明な主張となってしまう。大鹿卓の戦前の小説の多くは海外へ赴いた日本人の外地での適応の問題に関心を持っており、また彼らがいかに海外での生活的実践を通し、国家のポリシーを考え、さらにそれに呼応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を描いている。一方、従来、日本人と男性を主体にするという作者の書写戦略は、往々にして読者に彼の小説におけるヒューマニズムに対し、根本的質疑を持たせ、また民族主義的枠組みから脱していないという感覚を持たせている。そういう意味で、「夜霧」は上記の作品群の系譜に位置づけられると言える。一方、「夜霧」は言論的制限の時代に書かれ、その頃の日本は国際社会から孤立化されてもいた。それゆえ、小説の取材や構造、修辞学的な面から見ても、そして小説に見られる閉鎖的で自己完結的な、日本の対外戦争の歴史観から見ても、小説が十五年戦争の期間の日本精神史とはかなり密接なかかわり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また、小説からも当時の日本がいかに国際社会で窮地に置かれていたかをも十分、窺いしれよう。特に、日本のシベリア出兵に関する研究は戦前タブー視されていたが、この事態は、小説がいまだ重視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に一つの解釈を提供できるのかもしれない。戦争と人の流動の問題はいまだに存在している。最後に筆者が厭戦の思想を伝えている「夜霧」は、今日でも時代的意味を有しているのみならず、それもまた注意を払うに値する作品であ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北樺太、流離、「夜霧」、シベリア出兵、日中戦争

日本帝國保障占領下北樺太亞港的流離再現： 大鹿卓小說〈夜霧〉書寫的時代意涵

劉淑如

國立宜蘭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 前言

七〇年代首批透過社會科學處理全球化問題的學者之一華勒斯坦 (Wallerstein) 導入了世界體系的概念，提出資本主義是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力之見解，原因在於，「資本主義自十六世紀在歐洲出現，就不斷攫取傳統的新『大陸』、空間、社會主義的角落，並對它們進行根本的改變。」¹相對於此，吉爾平 (Gilpin) 在闡述其對全球化的看法中則強調，「全球化只有在國際政治的特定條件下才能出現，亦即全球化是一個「允許」(permissive) 全球秩序的產物；這是一個國家間的秩序，它允許各民族國家權威以外及其之間的互賴性關係網路建立、擴展和維持。」當然，吉爾平是基於對霸權力量之於自由的國家市場秩序的必要性的思維下，提出上述見解；²華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此一觀念架構也受到其在歷史上的新跨國現象的適用性問題之質疑。³然而吉爾平視政治權力為第二次現代性中的關鍵因素之觀點與華勒斯坦將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做聯結的思考，卻頗能說明跨界流離在戰前帝國主義時代「盛行」的「大背景」。

本文將探討的日本作家大鹿卓以日本保障占領下的北樺太亞港，⁴以及以日本的北海道這兩個城市為主要舞台所寫就的小說〈夜霧〉

¹孫治本譯，伍爾利希·貝克 (Ulrich Beck) 著，1999年9月，《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45、47頁。

²同1，52頁。

³同1，48頁。

⁴「北樺太」為日方用語。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占有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樺太」。日方所稱的「北樺太」即為俄國的「Sakhalin」(薩哈林)。本文基於各種表述語／情境所需，在論及日俄戰爭後日本占有的俄方所稱之薩哈林島的北緯五十度以南的領地時，以「南樺太」稱之；在提到小說舞台時，以「北樺太」稱之；另外，在觸及小說在廣義範圍的屬性時，將以「樺太(文學或小說)」泛稱之。另外，本文中的「保障占領」指的是日本為做為其在1920年5月的西伯利亞出兵期間與俄國革命軍交戰中發生的被捕日軍及日方居留民計百餘名慘遭虐殺的尼港(Nikolaiivsk)事件之反抗，是而要求俄方以北樺太做為保障賠償，予以占領。

(1939年9月)，⁵乃正以橫跨兩個日本對外擴張侵略戰爭—西伯利亞出兵與日中戰爭的時代，以及以資本主義特殊階段中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為背景。Stephen Castles 及 Mark J. Miller 在探討 1945年以前的國際移民時，強調政治所造成的遷移之重要性。⁶時至今日，政治所造成的遷移不僅仍是構成當代遷移的重要背景之一，且其規模更勝以往，其所牽涉的國家內部的族群與國際關係等層面之廣，亦使得問題更形複雜、益加難解。而包括政治因素在內，所有的因素所造成的遷移不僅可能改變人口、經濟與社會結構，也可能導致新文化的多樣性。⁷另一方面，遷移本身也深受保護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力學作用結果所牽制，尤其政治因素的遷移所涉及的議題之廣，除了宗教、貧富差距、人權迫害外，尚包括國際關係與各國內政與經濟問題乃至恐怖主義等。

大鹿卓的文學向來以關注社會議題著稱，普遍被認為具有強烈的寫實風格。⁸尤其在其戰前的小說裡，許多都深刻關心離開日本、前往海外(包括日本的殖民地、占領地)工作的日本人，其在面臨氣候與文化等均極為有別於日本時的適應問題，以及其與異種族之間的互動，還有其如何透過在異地的生活實踐，以切身的體驗思考並呼應帝國日本的政策等面相。⁹本文將討論的小說〈夜霧〉，¹⁰亦可視為上述系列作

⁵「夜霧」初出雜誌『都塵』(1939年9月)，後收錄於川村湊監修・解説、2001年9月、『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045 [樺太編] 2 大鹿卓著、《大鹿卓作品集》』、東京、ゆまに書房、194-229頁。本文參考的文本為後者。

⁶賴佳楓譯，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著，2008年5月，《移民——流離的年代》，台北，五南圖書，83頁。

⁷同6，5-6頁。

⁸一本出版於1930年2月的《日本現代詩研究》一書中，提到了詩人大鹿卓，論者曰：「大鹿卓以詩集《兵隊》為文壇打開一頁強烈的寫實表現之新局面」。參照金星堂、1930年2月、《日本現代詩研究》、東京、金星堂、221頁。另外，在小說方面，古谷綱武曾就大鹿卓的〈都塵〉一作，認為其為一「暴露小說」(揭發真實面的小說)。參照古谷綱武、2007年10月、「人間性の問題」、池內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16卷昭和14年、東京、ゆまに書房、399頁。不僅戰前，戰後島田謹二也在〈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未來〉(「台湾の文学的過現未」)一文中，主要針對大鹿卓的台灣系列小說，提出其文學如實再現深山中「內地人」(日本人)的生活與心理，「富於客觀的寫實手法」之時評。參照島田謹二、1995年6月、『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477頁。

⁹劉淑如，2016年1月，〈大鹿卓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與樺太之再現—以〈蕃婦〉與〈福壽草〉為例—〉，《政大日本研究》第13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153-190頁。

¹⁰〈夜霧〉初出《都塵》，東京，河出書房(1940年11月)(以上參照木原直彥編「樺太文學年表」。木原直彥、1994年10月、《樺太文学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438頁。)，後收錄於川村湊監修・解説、2001年9月、『日本植民地文学

品之延伸。從這些小說當中，可明顯看出大鹿卓對於日本的殖民地社會，或者對於如本文討論的小說〈夜霧〉的舞台之一的北樺太的亞港此一具有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之地政學意義的城市社會的關心，及對日本社會整體的關心。然而，大鹿向來以日本人及男性為主體的書寫策略，也不免令其小說作品招致了在人道主義上的根本性懷疑與未脫種族主義框架之評價。¹¹尤其寫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夜霧〉，其文本所涉及的時代背景亦包括以民生基本需求的人道遊行為本質的俄國革命，以及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此一干涉俄國內政的日本對外政策的歷史。

然而，小說中的要角除了大鹿卓上述作品系列中慣有的從日本流動到海外工作的日本男性外，主要便是受到俄國革命影響而離開家園的俄國貴族人物；另一方面，小說也與俄國革命背景當中的民生基本主張此一廣大的社會現實無緣。據此，本文將透過小說〈夜霧〉的個案研究，就文本中對帝國帷幕下的流離經驗的再現，趨近大鹿卓文學的本質。另外，由於小說書寫於日中戰爭全面開戰後的 1930 年代後期，當時日本政府對言論的箝制日益嚴峻；加以如後所述，日本軍部的西伯利亞出兵之相關研究，在戰前乃被視為禁忌，而這或許也是這篇小說在戰前始終未曾受到日本文壇・文藝界關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¹²是而，本文也將留意三〇年代到二戰結束前的日本精神史之動向，就小說的選題、架構、修辭等面向，思考小說的定位與時代意涵。

精選集〔樺太編〕2 大鹿卓作品集』、東京、ゆまに書房、194-229 頁。本文參考後者。另外，根據後者，小說乃寫就於 1939 年 9 月（參見該書 229 頁）。

¹¹同 9。

¹²〈夜霧〉寫就於 1939（昭和 14）年 9 月、發表於 1940 年 11 月，然而縱觀兩個年度的日本文藝時評，其中雖有針對大鹿卓其它小說的評論，卻未見針對〈夜霧〉者。參照前揭 8，池內輝雄編著、2007 年、『文藝時評大系』昭和 14 年第 16 卷及昭和 15 年第 17 卷。另外關於前述大鹿卓小說在昭和 14-15 年間的時評，例如宇野浩二在〈新春新人觀(1)〉中論及了「探礦日記」（初出『都新聞』昭和 15 年 01 月 15 日，參照前揭『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7 卷、17 頁。）、古谷綱武在〈人性的問題〉（「人間性の問題」）一文中提到了「都塵」（初出『都新聞』昭和 14 年 9 月 27 日，參照前揭『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6 卷、399 頁。）、豐島与志雄在〈作者之眸與夢〉（「作者の眸と夢」）中亦針對「都塵」做出評論（初出『東京朝日新聞』昭和 14 年 10 月 01 日，參照前揭『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6 卷、409 頁。）。另外，〈夜霧〉何以至今鮮少受到關注，其原因就筆者淺見，一來可能是由於大鹿卓文學研究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尚屬「小眾市場」；二來或因其人其作的相關討論目前乃主要集中在日治時期的台灣小說的部分。而上述的情況，事實上也未嘗不可將之置諸包括文學、歷史等在內的樺太研究在戰前戰後都遠不及日本其它殖民地如朝鮮或台灣等相關研究來得蓬勃發展此一現象的脈絡下理解。

2. 流離：帝國帷幕下的常態

〈夜霧〉發表於日中戰爭全面開戰後的1939年9月。故事以「我」於日本國內旅行途中在北海道的札幌小憩時，在鄉愁誘發下與居住當地的舊友即故事中的男主角新井聯絡後，兩人前往札幌近郊的定山溪溫泉敘舊做為序幕。在溫泉輕旅行的休憩情境下，兩人的話題由「事變」¹³如何影響彼此周遭之社會議題，轉向新井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以洋行員工身份隨軍前往日本保障占領下的北樺太的亞港工作時，與「落入凡間」的俄國流亡貴族蕾莎的一段異鄉戀曲的始末之個人歷史經驗。小說中新井與蕾莎的戀曲爾後不僅因日本的撤兵黯然畫下休止符而平添些許哀愁；更因日本結束占領後難以再度前往而更添幾分惆悵。作者透過這一齣日人新井與俄人蕾莎兩人在政經因素背景下的流動／離散而結合，並且再度因政經因素下的流動而被迫黯然分開的悲劇所欲訴諸的，由小說發表及小說劇中劇的時代背景與情節可知，並非僅止於對烽火戀情的輕聲嘆息，而是隱喻了較諸上述個人層級更為上位範疇的，以干涉俄國內政為首的爾來日本為躋身世界強權之林所做的對外擴張侵略之厭戰立場。

小說在一開始時，先是鋪陳了在日本國內旅行中的「我」的鄉愁；接著在新井開始陳述往日戀情時，又鋪陳了身處極地氣候環境下的異鄉人新井所深刻感受到的鄉愁。如是，作者藉由同為旅人的傾聽者「我」的角色安排，訴諸人情，為新井在異鄉的戀情開展提供一個可以將心比心、感同身受的聆聽背景，藉此引發讀者之共鳴。另外，小說以帶有流動性與非日常性的「我」的「旅途中」做為故事開始與結束的表述情境，且劇中劇本身發生的場景亦是同樣充滿著流動性與非日常性的多種族雜居城市-亞港，這些都使得整篇小說的敘事宛若架空在未根著的浮雲上而充滿了流動的意象。同時，藉由小說中兩個敘事框架的遠近內外之呈現，作者也為讀者勾勒出一幅帝國帷幕下人口流離的稀鬆平常之景觀。小說劇中劇的舞台-亞港為北樺太西海岸第一大城，

¹³就小說發表的1940年11月的時間點而言，此即當時所謂的「北支事變」、「支那事變」，以及戰後所謂的「日華事變」、「(第二次)日中戰爭」。參照小林英夫、2007年7月、『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消耗戦へ』、東京、講談社、3頁。

在樺太史、俄國（文學）史及日俄外交史乃至東亞史上，均占有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一來它曾是俄帝時代末期反羅曼諾夫王朝的政治犯被遣送的流刑地；二來俄國文豪契訶夫曾待在此地三個月進行流刑囚的實況調查，爾後並據此寫下他的傳世名著《薩哈林島》。¹⁴再者此地不僅是日俄戰爭後將樺太以北緯五十度劃分成南北的日俄談判之地；¹⁵之於本文更重要的是，俄國革命後日軍曾於出兵西伯利亞的期間保障占領此地。

如是，戰前的亞港乃為一具軍事戰略與日俄外交及文學史等意義之都市。而在小說中，亞港既是俄國流亡貴族蕾莎與日本洋行職員新井的邂逅地，也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的駐軍所在地之一，同時亦是體現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掛勾的事象之都市。小說中在交代蕾莎身世時寫道，俄國革命造成曾在俄國皇室美術相關單位占得極好位置的蕾莎的父親遭逢黨派革命之際遇，以致晚景淒涼；蕾莎的母親也因此落得必須變賣珠寶方能維生，並被迫攜女流亡他鄉之境地。蕾莎一家最後來到亞港投靠與父親同父異母的叔叔瓦希歷一家，未久母親積勞而死，兩姐妹則分別以毛皮商打字員及舞孃的工作維生。在姐姐搬進公司宿舍後，蕾莎仍續住瓦希歷家，這也成為蕾莎之後與新井這位一半受到瓦希歷慫恿，一半受到鄉愁及對俄人家庭生活的好奇感的驅使，因而自簡陋的洋行單身宿舍遷入瓦希歷家中的日人得以進一步接觸與交往之契機。

小說一開始在介紹新井時，便先強調他並非以駐軍軍人，而是A洋行辦事員的身份前往亞港，而他在那裡的工作主要是協助軍方補充石炭、石油、燕麥及乾草等軍需品。小說稍晚登場的另一名、也是唯二的主要的日本男性細川，則是從事口譯工作。小說中的新井雖非軍人，且小說也未明示細川隸屬洋行或軍方或其他，但從新井的工作內容與結尾處寫到新井將隨撤兵返日時所言及的細川將繼續和部分駐軍留下的描述可知，兩人在彼地的活動都與軍方（國家）密切相關。另

¹⁴該書為契訶夫於1890年至1894年期間寫成，書中揭露了他「對沙皇的苦役地，他心目中真正的“地獄”——薩哈林島」的印象。參閱上海譯文出版，1999年7月，《契訶夫文集》第十三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648頁。

¹⁵德田耕一、2004年5月、『サハリン』、東京、るるぶ、57頁。

外，細川在小說中也扮演帶新井認識亞港的「俄國通」一角。小說稱道他「俄語極好，為人又瀟灑，這使得他把和庶民的往來當成樂趣」，而新井「也因此經常跟著他出入許多地方。」¹⁶兩人經常前往的場所除日式居酒屋外，主要便是俄式舞廳，而後者正是新井與蕾莎的結識之地。另外，小說中出現的日本人除新井（洋行勞工／勞動型移工）和細川（洋行或軍方口譯／技術型移工）外，尚有日人街裡的日本藝妓與女侍（勞動型移工）及前往舞廳消費的操著日本東北一帶鄉音的男女勞工。除了日本人，尚有亦是出現於舞廳的「朝鮮」與「支那」勞工。

如是，小說以深具歷史意涵的城市—亞港為例，呈現出帝國帷幕下勞力、技術、資本（洋行）跨界／國流動的現代政經及多民族景觀。事實上，在俄國革命發生以前，俄國早已存在許多中國與朝鮮勞工。¹⁷同時，幕末期的俄國也早已有日本幕吏以及利用農閒期前往捕魚謀生的日本漁民的足跡。另外在明治初年，箱館府與其後的開拓使也招募不少農民工前往俄國。¹⁸而事實上整座樺太島自古以來便受到日、俄、中三國王朝或政府的干涉支配；且除了日、中、朝、俄人，島上亦有先住少數民族的活動足跡。這些都造就了該島的多民族風貌。¹⁹如是，小說中因政治與經濟等因素而導致的種族輻輳的景觀在亞港的呈現，乃有其歷史脈絡可尋。同時，小說中的日人新井與俄人蕾莎的「亞港愛情故事」，事實上也是在政治與經濟的因素下所促成的一段「異國戀曲」。而由於亞港所在的島嶼在地理、歷史上所具備的特殊的邊際性與疆界上的變動性，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該島在諸多面相上或因自然促成、或因人為導致的臨時、浮動之意象。

¹⁶大鹿卓、2001年9月、「夜霧」、川村湊監修・解説、『日本植民地文学精選集 045 [樺太編] 2 大鹿卓著、《大鹿卓作品集》』、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01頁。

¹⁷某露國通、1912年2月、「露國過激派統治の内容」、『太陽』第25卷第3号、東京、博文館、110頁。

¹⁸秋月俊幸、1993年、「明治初年の樺太—日口雜居をめぐる諸問題—」、『スラヴ研究』40号、札幌、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1頁。

¹⁹中山大將著、2014年『亞寒帶植民地樺太の移民社会形成—周縁的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植民地イデオロギー』、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59頁。另外有關日俄兩國對樺太島的爭奪，參照王鉞，1993年12月，〈俄國和日本對庫頁島的爭奪〉，《民族學報》第二十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57-69頁。其中有關中國與樺太島的關係及中國文化傳入該島的相關記述，參閱王論文 57、61-62頁。

3. 日常生活中的臨時·浮動意象

日本的西伯利亞出兵在本質上乃為一日本對外侵略的軍事行動，過程長達七年，最後以失敗告終。當中的要因除誤判情勢、輕視革命黨派布什維克勢力、軍費龐大、官兵折損過多之外，²⁰不可不謂與日軍在當地的適應不良有關。關於此點，作者在小說一開始時，便以新井對於當地嚴寒的氣候所伴隨的人生的希望與華麗隨之萎縮的內面感受的描寫試圖呈現之。除了對自然的不適應，小說也藉由新井在舞廳中強烈感受到的其在身形上的嬌小與因此衍生的自卑感，以及對於舞廳所象徵的西方文化所產生的格格不入感的描寫，說明日本人與西方人共處時的彳亍與不安。以下為新井向「我」陳述與蕾莎結識當天在舞廳的體驗談：

「當時我不愛跳舞，光是想像體型瘦小的自己被女人牽著轉來轉去的愚蠢模樣，我就提不起勇氣加入他們。在角落一旁的飲酒桌坐下後，我一邊對他們投以不屑的眼光，一邊對自己猛灌伏特加。話說這酒場只是名稱，說穿了不過就是在牆角邊擺一副桌椅而已。也因為這樣，男男女女的舞步不時朝著我逼近，有人踢倒了椅子，有人則差點撞到桌子，那景象可真夠嚇人的！而好幾次我也差點想抱著桌子逃開。」²¹

新井對亞港氣候的不適應與在身形上的自卑感、在文化上的格格不入感，很快地便藉由與蕾莎的男女關係找到抒發的出口。「因為她」，新井才「得以暫時忘却遠離故國的鄉愁，以及為荒涼與冰雪所阻隔的生活的憂愁。」²²在小說中，蕾莎一家是顯性的離散者，作者一面勾勒落難貴族蕾莎一家的政治受難者形象，一面卻也藉由庶民瓦希歷一家的「在地」幸福生活圖像的描繪，突顯流離失所的蕾莎與離鄉背井的異鄉人新井的交集之必然與合理。如後所述，從瓦希歷一家的住居及當地建築的描述可知，瓦希歷一家充其量只比蕾莎一家「早來一步」，其與土地的根著性仍非常稀薄。然而，一如小說中新井在向「我」介紹完荒誕滑稽的瓦希歷一家的生活圖像後所言之，他「實在沒有餘裕

²⁰ 林明德，1993年9月，《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323頁。

²¹ 同16，208頁。

²² 同16，219頁。

再多談」瓦希歷「這個人和他的家庭，還是趕緊進入故事主軸（筆者注：新井與蕾莎的亞港愛情故事）」²³所示，作者在小說中鋪陳瓦希歷一家，其目的除了為突顯出男女主角戀曲（日軍與俄國白軍合作）的嚴肅性外，也是欲藉此襯托蕾莎一家所象徵的俄國上流階級的樣貌。換言之，作者雖關心俄國革命下的俄國社會，但卻走上與一般日本官方一樣的，只停留在對俄國藝術與俄國上流女性之美的頌揚與讚嘆裡，以及俄國平民與上層階級的差異上的「不接地氣」之路。²⁴

前已提及，小說呈現出帝國帷幕下勞力、技術、資本（洋行）跨界／國流動的現代政經及多民族景觀，而伴隨著如此景觀的，則是由流動、臨時、偶在等字眼組合而成的意象。這些與穩固、願景、永恆、沉穩等無緣的不定之意象不僅表現在流動者新井的隨身行李敘述中、顯性流離者蕾莎所屬職場的建築空間的闡述裡，同時也顯現在隱性流離者瓦希歷一家在亞港的家的建築空間書寫上。首先，有關新井的隨身行李記述，是出現在瓦希歷大陣仗拉著馬橇前往新井當時居住的洋行單身宿舍去迎接他的時候。正當瓦希歷環顧四周欲尋找新井的行李，準備要幫他搬運時，卻赫然發發現新井的行李出乎他意料地少。當下他一面流露出驚訝之情，一面也忍不住大笑稱道，「這麼少的行李，根本不必動用到馬橇嘛！」²⁵也就是說，小說乃藉由新井的行李規模，強調當時日本人是抱著短暫居住而非久留的意識，前往該地的。不只流動的人，即便是不動的地面建築物，也以某種缺乏永續觀點思考下的形體，呼應著潮來潮往的流動的人。像是小說在描述舞廳的建築空間時便寫道，其「雖名之為舞廳，但也不過是以前教會做禮拜時用的一棟建築物。椅子搬開後，那滿地的灰塵令人彷彿能想見當時那些前來做禮拜的善男信女的足跡。一旁角落裡坐落著一架鋼琴，燭台上殘留

²³同 16，204 頁。

²⁴日本的俄國政治史學者菊地昌典指出，從俄國革命發生當時旅俄中的日人後來的體驗記或回憶錄當中，可清楚看出民間與官方對於當時俄國社會的關心面相之不同。即，相對於前者對革命本質與俄國社會的民生訴求的關心；後者則關注於俄國藝術與女性之美、俄國百姓與上流階級的差異等面相，而全然漠視凜冽寒冬中高喊要麵包的婦女與孩童們的遊行行列。菊地昌典、1974 年、「ロシア革命と日本」、『総合講座 日本の社会文化史』第七卷「世界の中の日本」、東京、講談社、277-278 頁。

²⁵同 16，199 頁。

的隨著聖歌的旋律擺動的蠟燭向下垂落的景象，就像是老婦人乾涸的雙手。至於背景音樂，靠的也不過是剛才那架鋼琴和一名頭戴黑帽的蓄著鬍鬚的男子用以演奏的手風琴罷了」。²⁶

然而儘管舞廳老舊陽春、欠缺經營，卻仍吸引不同年齡、階級、國籍、性別的人前來休閒消費，²⁷由此足見島上建設匱乏之一斑。而最後小說透過相對概念下的「在地人」瓦希歷一家的住宅空間描述，更突顯出移民根性下缺乏永續概念的建築景觀在島上普遍存在的問題。小說中瓦希歷的住家是位於一處原木住宅群中，屋裡擺設不但老舊簡陋，廳房的光線與動線亦不佳，而其中新井的房間除了暖爐、臥鋪與天花板上垂吊的燈泡外幾無長物。這樣的房間不但令新井感到比之前住的宿舍冷清，還令他覺得「像是被關在牢房裡一般」，跟「想像中沉穩而具古風的俄人住家」截然不同。²⁸另外關於瓦希歷一家的出身，作者在小說中除了營造其庶民階層的氛圍外，並未多做說明。然而如前所述，小說中的舞台—亞港在沙皇專政末期時，便曾是流放反羅曼諾夫王朝的政治犯的流刑地；²⁹加以俄國為建設該島為遠東煤炭基地，也曾將大批苦役流放犯人送到島上。³⁰這些人構成了島上俄人的多數來源。職是，瓦希歷一家與蕾莎一家便只有「先來後到」的問題，而無「在地人」與「外來者」的截然分別。

如上，作者透過新井在亞港一地的生理上的不適應，以及面對西方時的心理上的不自在（自然反應），還有他這位「流動者」與俄人瓦希歷一家象徵的「在地人」之間的界限模糊的移住民，這兩方從隨身行李的輕便與生活中的公私住宅建築的缺乏永續思考所呈現的在文化上的無為（人為意志），為讀者呈現出充滿臨時與浮動意象的人、事、物景觀。若再加上新井與蕾莎的戀情始末—前者因日方駐軍而結合；後者因日方撤兵而分開—背後所彰顯出的帝國帷幕下，地方上鄰坊組成的多變性，就更加使得小說的流動性基調為之深化。而作者透過流

²⁶同 16，207 頁。

²⁷同 16，207-208 頁。

²⁸同 16，199-200 頁。

²⁹同 15，57 頁。

³⁰同 19，王鉞前揭論文，64、67 頁。

動者日人新井與流離失所的俄人—蕾莎的日俄戀情所暗喻的，如前所述，乃是一段日本近代對外侵略史，此即日本利用俄國內部的革命，趁機出兵西伯利亞，以圖擴張勢力。日本的出兵，表面上是協助俄國的白軍抵抗革命軍，在此一大義名份之下，形塑先進而富強的現代日本，以及與此對置的落後而待援的傳統俄國，自有其必要。作者固然在小說中展現出對蕾莎／俄國的人道關懷，然而其透過俄國內政紛亂下的離散者蕾莎之口所訴諸的例如「日軍撤兵將使俄人頓失依靠、無所適從」等言論，³¹卻是一種美化與粉飾的修辭，間接隱蔽了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在本質上實屬擴張侵略的軍事行動之事實。同時，此種對以蕾莎為首的俄人整體在性別、種族、階級上的壓迫與優越感，也貫穿全文，成為小說另一個鮮明的主張。

4. 貧窮、落後、弱小、傳統的俄國素描

菊地昌典在考察俄國革命與日本之間的關聯性時，曾經提到在俄國革命的年代，日本人已普遍存在對俄國人的優越感一點。事實上，日本人對俄國人的優越感早在日俄戰爭後便已存在。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將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南樺太割讓給日本，日本因此繼占領台灣後更添「男性雄風」，而這種雄風甚至存在於日本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如德富蘇峰·蘆花兄弟等人身上。³²這表現在大鹿卓的〈夜霧〉當中，便是男主人翁新井這位日本人對貧窮、落後、弱小、傳統的俄國的發現。小說的劇中劇，開門見山便用了「滿臉的窮酸樣加上一身的酒氣」來形容新井對瓦希歷的第一印象。³³

此種對俄人窮苦生活圖像的描寫，還出現在新井為報答蕾莎為他縫補衣裳之恩而贈禮給她的情節裡。小說提到當蕾莎收到新井外出為她買來的襪子後，心滿意足地連忙換上，並「開心地踏起舞步來」。新井見狀後除驚訝「一雙襪子竟能讓一個少女如此開心」外，也有感於當中所透露出的蕾莎的際遇，而這令他「不禁紅了眼眶」。帶著這份憐

³¹同 16，227 頁。

³²同 24，菊地昌典前揭書，270-273 頁。

³³同 16，197 頁。

憫的心，新井接著打開隨同襪子一起買回的培根與罐頭等，向蕾莎「勸食」。³⁴這一幕呈現的，既是在經濟上與情感上滿足點都極低的俄國女子圖像，也是在經濟上游刃有餘、在情感上居主導位置的日人居高臨下的視線。另外像是小說還提到新井經常目睹嗜酒的瓦希歷收工回家後遭妻子討工資的畫面，³⁵以及當其妻發現他四處偷藏酒錢後「拿著擀麵棍追著他跑」的景象。³⁶且如前所述，小說也花了許多篇幅描述當地陳舊落後的建物景觀與意象。

小說中將日本人置於極高點的位階觀，另外還可以從瓦希歷向新井推薦家中空房時提出的租金將特別優待，³⁷以及新井在搬進瓦希歷家的當天見到「有著俄國婦女中常見的啤酒肚」的、「一個勁兒地聒噪諂笑卻是不知所云」的女主人後心情奇差無比，因而將瓦希歷全家統統趕出房間的描寫中，窺得端倪。³⁸而小說對於深諳俄文並從事口譯工作的細川「俄文流暢到把接觸下層民（筆者注：指俄人）的事情當成了趣味」的描寫，³⁹更清楚暴露出作者的階級觀。尤其在接近小說尾聲時，作者所安排的讓蕾莎在察覺到新井將隨日軍撤兵回國後的一番「俄人若喪失日軍的庇護，將頓失依靠、無所適從」的反應，更令此一觀點被放大及深化：

「街頭上盛傳日本兵就快回去了！我們好不容易已經習慣有日本兵，這會兒日本兵一走，

革命派新政府的人就會進到城裡來，到時我們該怎麼辦？」⁴⁰

之後當蕾莎不斷追問新井是否也將離開時，新井先是搪塞支唔，後來提出「就算回去也會來接你」、「若不放心我將旅費預留給你」等解決方案。如此一來一往後蕾莎哭著睡去，接著小說寫道，望著蕾莎的臉龐，新井「感到她的心裡與眉宇之間都深藏著亡國之憂」，而這也不由地令他「感傷了起來……」。⁴¹至此待拯救的弱小民族俄國的圖像

³⁴同 16，213-214 頁。

³⁵同 16，202 頁。

³⁶同 16，203 頁。

³⁷同 16，198 頁。

³⁸同 16，200 頁。

³⁹同 16，201 頁。

⁴⁰同 16，227 頁。

⁴¹同 16，228 頁。

更臻清晰；且打著協助白軍抵抗革命軍的日軍的出兵名義也因此順勢被正當化。另外，同樣面對俄國人，作者也呈現出不同的階級觀。亦即，蕾莎雖由俄國帝室裡的上流階級淪為亡命之徒，且在母親死後也當起舞孃來，但之於新井，她不僅是一位在幫他添加暖爐用石炭時會避免將臀部朝向他的有教養的女子；⁴²也是在他於舞廳感到不適時幫助並提供他「充滿真誠周到照顧」的一位「不同於舞廳裡其它舞孃的女子」。⁴³這樣的蕾莎對照起瓦希歷的兩個宛如童話〈灰姑娘〉中繼母女兒般滑稽的形象—例如小說曾出現瓦希歷大女兒於某日整理頭髮時誤將火鉗當成髮卷，以致髮絲燒掉一大束的情節—；⁴⁴以及瓦希歷妻子那肥胖聒噪且會埋伏在酒店外等丈夫，並在追逐丈夫時不慎跌倒爬起後「胸前如波浪般撲通抖動，嘴裡還發出痛苦喘息聲」地醜態盡出的形象，⁴⁵以及前述拿著擀麵棍追打丈夫的剝悍形象，便益發顯得清新脫俗、高貴典雅。

透過蕾莎與瓦希歷妻女形象的對比，可看出作者有意藉此突顯俄國上流與下層階級之間的落差；另外，從小說中新井在異鄉的種種不適應，最終藉由輕易收服蕾莎的心而找到出口的情節安排，更可看出作者試圖彰顯日人至高位階之用意。事實上，上述小說中以瓦希歷為首的俄人對新井這位日人不僅毫無抵抗，且還歡迎奉承、百般照顧的此種將日人奉為貴賓款待的情節，並非〈夜霧〉之創舉，而是可追溯到日俄戰後日本統治南樺太後不久的明治末期的日本文學。⁴⁶而此類的橋段之書寫固然如前所述，源自於日本在日俄戰後的優越感；另一方面，也未嘗不可從俄國官方在戰敗後對樺太住民的指示中找到脈絡。根據志賀重昂在1906年6月19日的「樺太境界劃定日記」中的記載，俄國軍務知事瓦魯威夫將軍在向俄國領地全民頒布的告示中，曾如下呼籲俄人須善待俄國領土上的日人：

⁴²同 16，206-207 頁。

⁴³同 16，210、212 頁。

⁴⁴同 16，203 頁。

⁴⁵同 16，201-202 頁。

⁴⁶劉淑如，2016年6月，〈田山花袋小說中的殖民地樺太與台灣的再現—以〈阿留夏〉〈真岡〉與〈山中巡查〉為例—〉，《高大人文學報》第一期，高雄，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155-182 頁。

「昨日的敵人—日本，隨著和平的恢復，如今成了吾人的善隣。自古以來，俄國人便習慣與善鄰保持友好的關係。因此，若此善隣因遊玩或洽公而前來吾人領土拜訪，身為主人的我們，應毫不遲疑地竭誠歡迎、款待之。我等樺太人民也應展現出俄國人的真誠，在日本賓客滯留的期間予以充份之協助，並以此相互勸勉。然而，族人中難免有不合羣者，因此本人在此要呼籲所有住民們，願大家能夠互相提醒，以制止這些意圖對日本賓客不敬之徒。」

47

亦即，日人對俄人的優越感，除了身為戰勝國的氣焰使然，或許也是從俄國對其自身的「規範」——而這極可能是「識時務者為俊傑」的一時的權宜之計——中找到了「法源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日人對俄人的優越感裡，其實是充滿了矛盾與掙扎，其中並不難發現自卑／崇拜與輕蔑感的交相雜糅。例如在新井於舞廳中邂逅蕾莎的一幕當中，新井離去前為了答謝蕾莎，試圖從口袋掏錢塞給蕾莎，但卻被她嚴正拒絕。此事不僅之於新井是「徹頭徹尾的醜態」，更令他「再也提不起勇氣進入舞廳」；同時，透過此一經驗，新井也從蕾莎身上發現了某種的「單純」。⁴⁸另外例如像是前述新井在舞廳中一面流露出對自己體型嬌小的自卑感與對蕾莎這位俄國女性的崇拜與孺慕之情，一面卻也竭盡所能地醜化俄國（人），而這未嘗不是日人的西方憧憬的幻滅與受挫有以致之。

菊地昌典在考察俄國革命前的俄國與日本人的關係時，曾以日本的托爾斯泰主義者—德富蘆花·蘇峰兄弟在明治末年拜訪托爾斯泰，親眼目睹沙皇治下的俄國社會的悲慘生活實態之舉目皆是無知、骯髒的貧農後「悵然失落」的例子，說明日本思想家儘管擷取俄國的偉大思想，卻對該思想得以成立的基盤存在著矛盾的生理上的厭惡感。⁴⁹他更進一步指出，類似這種「只重偉大思想而不問背後真諦、不願理解俄國社會的思考模式，堪稱是日本人特有的思維」。⁵⁰而這種日本人獨

⁴⁷志賀富士男編、1928年2月、『志賀重昂全集』第五卷、『大役小志』、東京、志賀重昂全集刊行會、36頁。

⁴⁸同16，211頁。

⁴⁹同24，271-272頁。

⁵⁰同24，273頁。

特的思考方式也出現在〈夜霧〉裡，因為文本始終只呈現落後、弱小、貧窮的俄國社會而不問其背後的真義，也無意關心真正的底層。

其次，伴隨著前述新井欲以實質可量化的金錢做為與蕾莎恩情的交換遭拒而產生自卑感的，是某種現代與傳統相遇時的失落。戴維斯（John Davis）在其交換（Exchange）理論中探討貨幣這個符號系統時提到，「一些人認為，既然貨幣是可以度量的，相對於真正的符號，自然少了許多詩意」、「真正的符號給人朦朧難以捉摸之感，比起銅臭，它才是人類創造力更為高雅的一種表現。」⁵¹勒富布浮（Henri Lefebvre）在論及工業資本主義所孕育出來的「在性質上都極具功效性」的日常生活時也指出，「此種生活形態具有強烈的公式性格，缺乏道德意義，而某種他稱為『生活詩意』（the poetry of life）的層面也已蕩然無存。」⁵²新井的貨幣－恩情交易挫折與社交行為退縮所反映的，正是勒富布浮所指稱的現代「世俗散文」在遭遇傳統「生活詩歌」時所產生的對自身（現代性）的掙扎、躊躇、質疑與反思。只是，在如此「停下腳步」後，小說終究還是將「我們」與「他們」劃清了界線。因為如後所述，小說不僅消極迴避了日軍在出兵西伯利亞的期間對俄人施暴的史實；更積極採取了讓新井與細川一類軍方周邊角色於文本中以宛若「救世主」般形象之登場，藉此將在本質上為侵略屬性的西伯利亞出兵訴諸大義名份，以及藉由將新井與蕾莎男女關係的浪漫化，掩飾模糊了日軍在俄國的暴行。

5. 西伯利亞出兵失敗的殷鑑不遠

儘管大鹿卓將日本的西伯利亞出兵訴諸義理，並藉由將新井與蕾莎的男女關係的純化與美化，迴避了日軍在俄國占領地的暴行，但實際上小說最重要的主張卻是在傳達厭戰的思想。在小說的劇中劇開始之前，新井在向「我」暗示他要講的故事乃與一名女子有關之後，「我」予以揶揄一番，對此，新井不僅嚴正地遏止，還懇請「我」帶著聆聽

⁵¹ 教軍譯，戴維斯著，1998年11月，《交換》，台北，桂冠圖書，101頁。

⁵² Henri Lefebvre, 1971,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p29. 此處引用廖仁義譯，紀登斯著，1995年10月，《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台北，唐山出版，108頁。

他「懺悔錄」的心情，聽他訴說這段嚴肅而沉重的往日舊情。⁵³而小說最後寫到這段往事的結局，即蕾莎姐妹與細川三人前來碼頭為新井送行橋段中的新井與蕾莎別離的一幕，不但呈現出烽火戀人難分難捨卻又不得不然的無奈與傷感，從新井與蕾莎的戀情與日軍與俄國白軍在當時的關係與最後的結局（戀情破局、日本干涉俄國內政失敗）重疊的角度，以及從小說發表的時代背景、小說中將故事與劇中劇的時代背景串聯起來的架構等面相而言，作者所欲傳達的對於戰爭影響百姓日常生活之深之廣的厭戰思想，以及對於日本重蹈當年出兵失敗覆轍的隱憂，也不言而喻。以下為小說最後「我」對讀者描述新井在溫泉旅館向「我」憶及他離開亞港、與蕾莎永別當日情景的橋段：

『我以為蕾莎之前原本抱著希望認為我會回來，但那天似乎已經放棄。然而，就在我從碼頭上船，船也開始啟動時，卻聽到她悲傷地不斷哭喊我名字的聲音。在傍晚時分的夜霧之中，那聲音愈來愈微弱，而當她的身影消失不見，此時我再也隱忍不住。船身已移往停泊在遠方的大船，昔人也早已杳然無蹤。夜霧中，只見哭成淚人兒的街燈逕自閃爍著』

接著新井抬頭望著天井說道，

『就像這樣』，

此時我看見一盞昏暗的燈光，在我們的頭頂上微微光亮。」⁵⁴

如上，作者乃試圖透過小說劇中劇的書寫，揭露在本質上分別為俄國內政與日本對外侵略的俄國革命與西伯利亞出兵此一政、軍情動盪下所造成的人的流離及其如何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景觀，例如在經濟、居住空間、休閒、地方鄰坊組成、身心理等方面。小說中新井乃是隨著日軍在出兵西伯利亞的期間駐軍於北樺太的亞港而前往該地，最後也隨著日軍的撤退而離開亞港。小說並未交代日軍是在何種歷史背景下出／撤兵，出／撤兵自始至終在新井與蕾莎的異國戀裡只是一種時代背景。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首先，在進入小說主軸之一的新井與蕾莎的異國戀之前，作者便如下以「我」與新井在溫泉旅館泡湯敘舊時所聊到的遠近（時間）話題做為伏筆，隱隱將西伯利亞出兵

⁵³同 16，196 頁。

⁵⁴同 16，229 頁。

(遠)與日中戰爭(近)的關聯串起：「一開始我們聊著事變發生的過程及其如何影響周遭等最近的事，後來(中略)話題逐漸轉向過往的回憶。」在旅館女中舖完床離開之後，新井開始切入主題：「最近每每讀到日蘇問題的報導，就令我想起亞港來。」⁵⁵而由小說後續的發展可知，此乃與俄國革命期間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歷史有關。

俄國革命發生的當時，日本官方出現了以當時日本前後任外相本野一郎、內田康哉等為代表的積極出兵論與反對論兩派。前者乃基於新竄起的布爾什維克政權不過為一短命政權，因此不妨趁著局勢混亂之際，占領西伯利亞一隅，強奪其資源之立論。⁵⁶相對於此，後者則訴諸貼近現場的對革命本身擁有絕對強大民意基礎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之判斷。⁵⁷另外，當時一貫站在反對出兵之立場的《東洋經濟新報》更駁斥俄國新政府若與德國私下講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日俄同屬協約國陣營)，將使德國在政經方面對日本造成威脅的假設說，認為基於各國自由平等互惠之原則，俄國的民主化與獨立性的恢復將有助於促進經濟交流。該報並直指日本人民「最該懼怕的絕非俄國的單獨講和或者德國，而是對於此局勢的缺乏洞察」，因為若日本看不清「當前帝國主義在政治與經濟面都處於被宣告總破產中」的事實，「將背離世界文明」，故而「當前誠然為日本的危機而非俄國的。」⁵⁸

儘管如此，日本仍基於種種目的與理由如初期的捷克軍救援、中期的鐵路管理與沿線警備、後期的鄂木斯克政府掩護及邊境自衛論等，執意出兵。⁵⁹在出兵後的時事評論中，尚有論者援用中國《司馬法》中「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的思想，並提出就連財力深厚的美國也不忘整備文明軍備以壯大武力，則是日本亦應好好向其取經的主張，企圖合理化其西伯利亞出兵。⁶⁰另一方面，日本出兵的過程相當混亂，以軍力佈署為例，派到東西伯利亞支援反革命勢力的七萬三千名兵力，遠

⁵⁵同 16，195 頁。

⁵⁶同 24，286、289 頁。

⁵⁷同 24，284 頁。

⁵⁸初出「露国悲觀す可からず」『東洋經濟新報』第 807 号、7 頁。引用自 24，297 頁。

⁵⁹淺田江村、1919 年 1 月、「時局の印象—西伯利増兵問題」、『太陽』第 26 卷第 1 號、東京、博文館、13 頁。

⁶⁰傳寶樸津、1920 年 2 月、「好戰と忘戰」、『太陽』、東京、博文館、129-142 頁。

遠超過原先與英美協定的一萬二千名，即使如此，反革命勢力依舊節節敗退。至此，日本等國的干涉未果已成不爭之事實。唯相對於英法於 1920 年 6 月前撤兵完畢，日本仍以防止革命波及朝鮮與滿州，以及以保護西伯利亞居留日人等名義維持出兵。尤其 1920 年 5 月在日軍與革命軍的交戰過程中發生的被捕日軍與日方居留民共計百餘名慘遭虐殺的尼港(Nikolaivsk)事件，⁶¹不僅給了日本持續干涉的藉口，對於本文而言更重要的是，日方大肆利用此一事件煽動反俄情緒，並要求俄方以北樺太做為保障賠償，予以占領。日本此舉不僅招致西方國家之批判，亦引發其國內強烈的反彈聲浪，是而日本終於在 1922 年撤兵，唯北樺太的撤兵則是拖到日蘇基本條約締結後的 1925 年 5 月。總計日本的西伯利亞出兵不僅耗時七年，損耗戰費更高達十億日圓，⁶²以菊地昌典所說之當時新任外相內田「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幫本野拼命推動的西伯利亞出兵計劃的失策擦屁股、為出兵行動收拾善後」⁶³一言以蔽之，整件事可說「以徹底的失敗告終」，⁶⁴「既延緩了俄國內戰的終結，亦加深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⁶⁵

而這一段日本帝國主義下以侵略擴張為基調的干涉俄國內政失敗的歷史，明顯地與小說主軸之一的新井與蕾莎的異國戀最終以分手收場的情節重疊了。小說表面上看似主要在描寫發生於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期間的一段日本男性與俄國女性的異國戀情，然而由前述小說在一開場時所暗示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與日中戰爭之間的關聯，以及由小說發表的日中戰爭此一時代背景的角度觀之，可明顯看出作者欲藉由過去西伯利亞出兵所伴隨而來的日方巨大損失的歷史的重提，以對當前同樣基於日本帝國主義所引發的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提出警訊之意圖，而這也是小說的另一個、也是最主要的旨趣。前已提及，西伯利亞出兵耗時約七年，而小說發表當時日中戰爭雖才發生兩年多，但八年前已有滿洲事變。另外，二者在派兵之前，日本國內都曾有過贊·

⁶¹另譯「廟街事件」，參見 20，林明德前揭書。

⁶²由井正臣、2000 年 11 月、『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101 頁。

⁶³同 24，285 頁。

⁶⁴同 62，101 頁。

⁶⁵原暉之、2011 年 3 月、「ロシア革命とシベリア出兵」『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 4 卷「社会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 1920 年代」、東京、岩波書店、43 頁。

否兩論的激烈對立；⁶⁶也都曾發生過在內部意見尚未統合之際，各路人馬各自對外發言，以致引發對外政策矛盾之現象，以及深受軍事觀點主導下的重要對外政策先行決定與發佈，造成外交單位在「既成事實」後追隨之的「軍事外交」此一太平洋戰爭前日本獨特的「雙重外交」弊害之苦。⁶⁷加以日中戰爭之後，日本與列強之間的對立更為激化，例如在小說發表前的一年之內，日本不但與蘇俄有過兩次武力衝突，與美簽訂的通商航海條約也遭到美方所廢止，⁶⁸這些無不加深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孤立。而事實上早在滿洲事變發生後約半年，日本便已放棄國際協調主義退出國際聯盟，選擇軍國主義這一條一意孤行之路。⁶⁹就此意義而言，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諸多共通點。

另外根據日本《朝日新聞》在1938年3月5日的報導，日本自日中戰爭爆發以來對中國的軍費支出，在當時便已超過日俄戰爭時戰費總額的七倍之多。⁷⁰加以日方在日中戰爭中採取的是速戰速決的殲滅戰，而中方則是以長期抗戰的消耗戰因應之，⁷¹在日方戰略踢到中方拒絕講和、打算長期抗戰的鐵板後，發動日中戰爭的近衛文麿以中國事變擴大、內外政策難以推動為由，於1939年1月提出了內閣總辭，⁷²至此官方版的「挫折」乃顯而易見。至於軍民版的「挫折」，從匯集了當時中日兩國兵民間萬餘封書信的《關東憲兵隊通信檢閱月報》當中，也不難嗅出戰時下日本人的厭戰氣氛，以及找到日軍的紀律鬆散等跡象。⁷³其中有些還提到了戰況不利日本、治安敗壞、畏敵，以及日本國內經濟如何窮困、人民生活如何痛苦、百姓又是如何抱怨通膨等等。⁷⁴相較於上述日本的情況，以戰爭初期為例，則中國不僅「已經顯露出某種全社會的”國內和平”（Burgfrieden 或 Burgfriedenspolitic）」此

⁶⁶ 盧溝橋事變一發生，日本陸軍內部即出現基於對蘇戰爭爆發的恐懼之戰事不擴大派，以及藉機實現將中國華北分離的擴大派兩種對立的意見。參見 62、153 頁。

⁶⁷ 細谷千博、1955 年 7 月、『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東京、有斐閣、14-15 頁。

⁶⁸ 同 20，364

⁶⁹ 同 20，356-358 頁。

⁷⁰ 傅啓學編著，1987 年 10 月，《中國外交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591 頁。

⁷¹ 同 70，589-591 頁；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5 頁。

⁷² 同 70，593 頁。

⁷³ 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55-162 頁。

⁷⁴ 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82-184 頁。

一權宜性的擱置內部分歧的合作現象，⁷⁵整體而言其戰鬥意志亦較為旺盛。⁷⁶

在上述這種日本舉國上下紛紛在這場以侵略主義為本質的日中戰爭中受挫與受難的時代背景下，以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干涉俄國內政為時代背景的日本男性與俄國女性的異國烽火悲戀小說〈夜霧〉的發表，格外顯得別具意涵。這一點亦可從戰後日本研究西伯利亞出兵的先驅學者細谷千博在其 1955 年出版的《西伯利亞出兵の歴史研究》一書於 2005 年的再版時的後記當中所提到的，西伯利亞出兵の歴史不但成為日中戰爭時期日人の借鏡對象，更足以供做 21 世紀初日本再度面臨伊拉克戰爭中自衛隊派遣問題時的寶貴歷史資源的一段話中獲得佐證：

「西伯利亞出兵の歴史對日本軍部來說，是一個失敗の記錄。在戰前，相關の研究被視為禁忌，因此，過去極少有人從日本在此戰爭中の對外抉擇上所犯下の錯誤與軍事行動の醜陋面，切入去研究它。然而這場戰爭確實有許多值得後代借鏡之處，例如我相信熟悉西伯利亞出兵這一段歷史の軍人在日中戰爭時就已經懂得活用它，視其為一種反省の資源。因為這段西伯利亞出兵時日本單獨出兵の歴史已經充份說明，一旦派兵，撤兵將會有多麼の困難。(中略)最後，我相信西伯利亞出兵の這段歴史教訓，應當也有助於我們目前對於伊拉克戰爭の思考。」⁷⁷

綜上所述，發表於日中戰爭開戰兩年餘の大鹿卓の〈夜霧〉這篇小說，堪稱為當時瀰漫於日本社會的一片厭戰思想在文學上の體現。另一方面，西伯利亞出兵の契機為俄國革命，後者為人民所發起，訴求是「建立在要麵包の源自饑饉の人道遊行の基礎之上」。⁷⁸其次關於日軍駐兵亞港の期間對當地俄人施暴一點，不僅當時前往亞港旅行の日本作家河合裸石指證歷歷，稱道日本「軍夫如野獸般」在街上「四處施暴、大耍威風，丟國家の臉」、「讓俄國人受盡受難」；⁷⁹戰後高橋

⁷⁵ 詳見何銘生，2016 年 1 月，〈從希望到失望：戰地記者與國民黨政權一評柯博文著《中國的戰地記者：抗日戰爭の遺產》〉，《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編，《抗日戰爭研究》2016 年 1 月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156 頁。

⁷⁶ 同 13，小林英夫前掲書，155-157 頁。

⁷⁷ 同 67、312 頁。

⁷⁸ 同 24，278 頁。

⁷⁹ 初出河合裸石、1911 年 5 月、『薩哈噠の旅』、小樽、いろは堂。參照木原直彦、1994 年 10 月、『樺太文學の旅』(上)、札幌、共同文化社、398 頁。

治在其報導文學《派兵》一系列的書當中，更透過口述訪談，揭露當時日本軍方與俄國女性之間紊亂的男女關係，⁸⁰以及在進出西伯利亞的日本居留民當中，許多表面看似在經營攝影店、洗衣店等等，背地裡則是在從事賣春行業，且規模還相當龐大等內幕。⁸¹然而這些作者絲毫未提及，取而代之的是對俄國上流階級的浪漫視線與純潔受難的日俄戀情。如前所述，小說中對於時代背景及其關鍵字例如「事變」、「出兵」、「撤兵」的言及不僅欲言又止，在措辭上也極為小心地避開了「失敗」一類的字眼。這一方面固然可能有文學上的考量；然而另一方面在小說發表的1939年9月的這個時間點，日本早已實施言論箝制，「轉向」成為當代許多日本人必須面臨的人生課題。職是，關於上述小說中對於俄國革命下的庶民社會的現實與日軍在駐軍地的行徑的忽略，也必須從細谷千博所說的這「失敗的記錄」在戰前被視為禁忌的觀點，以及日本精神史中的「轉向」此一層面切入，加以思考。

6. 從禁忌與轉向的脈絡看〈夜霧〉

如前所述，小說一開始雖隱約將「事變」與「出兵」的關聯串起，但直到小說結束，卻未再觸及「事變」二字，也未從正面言及「失敗」。另外，小說雖暗示「事變」對人們的影響，卻也未進一步書寫其實質的影響內容，而是藉由「出兵」年代下的人的流離及其影響下的諸景觀影射之。同時，「出兵」年代的日俄戀情一直到小說的尾聲之前，都被作者以主戲的樣貌前景化；反之日中戰爭則是一種背景，且比起前者，後者的輪廓顯得模糊不清許多。然而如此的策略到了小說的結局處，情況卻出現了轉折。也就是說，儘管作者在小說結尾處仍隻字未再提及日中戰爭，但至此「夜霧」一詞所具備的跨時空多重意涵卻已呼之欲出：它除了指涉主戲的敘事者與聆聽者在溫泉旅館進行「Men's talk」時溫泉煙霧繚繞的景象、主戲中男女主角的別離哀愁、男主角新井憶及過往悲從中來熱淚盈眶的意象之外，更重要的，更是在間接傳

⁸⁰參照高橋治、1973年9月、『派兵』第二部「シベリアの虹」、東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朝日新聞社、318-324頁。

⁸¹高橋治、1977年3月、『派兵』第四部「凍土の孤影」、東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朝日新聞社、229頁。

達出作者對於當前日中戰爭感到無奈悵然之意象。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對日本影響甚鉅。隔年民眾自發的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米價上漲的所謂「米騷動」在各地遍地開花。該事件也帶動日本國內民主主義的民眾運動的升溫，包括女性運動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絡繹不絕，且此一氛圍也為「大逆事件」以來被打入「冬的時代」（「冬の時代」）的日本社會主義者開啟「重出江湖」之契機。⁸²最終，無畏於政府的層層打壓，支持蘇維埃政府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最終仍在國際共產黨組織的援助指導下，成立了日本共產黨（1922）。⁸³而當局為防止國內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激化，之後也公布實施了《治安維持法》（1925），該法開宗明義便揭示將懲役或禁錮「以變更國體或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之結社組織」。⁸⁴且起初該法雖主要用來懲戒日共，但後來也被拿來套用在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以對國民進行思想控制。⁸⁵另外，其端出極刑的做法，「最終也令日本全國的知性風土整個被荒廢掉」。⁸⁶緊接而來的金融大恐慌與日益激化的社會運動，促使日共開始明確提出推翻國體的目標，而政府也以大舉整肅日共因應之。在此風聲鶴唳的年代，許多黨員例如野呂榮太郎、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不是自殺、死於獄中，便是遇害，⁸⁷另外像是當時在獄中堪稱共產黨最高領導者的左野學及鍋山貞親等，則是選擇了轉向（1933）。⁸⁸

事實上，在〈夜霧〉發表前一年半，日本文壇才剛剛發生了石川達三的「發禁」事件。石川當時寫了一篇〈未死的兵〉（「生きてゐる兵隊」），發表在《中央公論》1938年3月號。⁸⁹但在雜誌發售的

⁸² 日俄戰後日本經濟復甦，大量勞工湧入都市。在勞工自覺與中小工商業界對政府增稅等抱怨連連的背景下，日本社會黨成立。該黨大肆利用社會的不滿煽動群眾，進行激進的社會運動，其間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的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他主張勞工直接罷工以改變社會，而就在其主張在黨內獲勝後，政府隨即發令禁止日本社會黨的結社，此後更持續彈壓社會主義者。1910年5月，長野縣明科的製材所的職工宮下太吉自製炸彈計畫暗殺天皇的行跡敗露後，幸德被捕，許多社會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也遭到連坐處置，此即所謂「大逆事件」。事件後，政府更藉機大舉彈壓左翼運動者及天皇制的批判思想。參照 62，由井正臣前揭書，72-75 頁。

⁸³ 同 62，102-106 頁。

⁸⁴ 同 62，113 頁。

⁸⁵ 同 62，113-114 頁。

⁸⁶ 鶴見俊輔・久野収、1998年2月、『現代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68頁。

⁸⁷ 同 20，350-351 頁。

⁸⁸ 李永熾譯，鶴見俊輔著，1983年12月，《日本精神史（1931-1945）》，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4頁。

⁸⁹ 同年七月中國發行了中譯本。參照夏行譯，1938年7月，〈未死的兵〉，廣州，

同時，該雜誌也隨即遭到禁止發行的處分，原因就在於石川在該小說中「生動地描述了日軍在上海戰役中的殺戮、強姦、搶劫」等情節而「踩到當局的地雷」。具體而言，在檢閱中被刪除的部分主要是關於日軍姦殺中國女子或姦殺後搶劫、殺害疑似竊賊的中國人煮飯工等場景描寫。⁹⁰而此一處分也「深深影響了爾後日本的戰爭文學」，⁹¹包括後來的火野葦平著名的「兵隊三部作」與吉川英治的中國系列作品中的〈夜間司令官〉（「夜の司令官」，『週刊朝日』1938年1-3月連載）等作品在內，均避開了殺姦擄掠等戰爭的殘酷場面，以及日軍打敗仗的場面，而呈現出一種「只要寫出多數將兵在戰友愛中堅守團結、盡忠職守的故事，輔以犧牲者的英勇事蹟，然後再適度散發一些文學芬芳的作品即可」的「受檢閱後大同小異」的調性。⁹²

由此觀之，〈夜霧〉中絕口不提「失敗」、姦殺擄掠，以及「完全漠視」在俄國革命的背景中「那些在凜冽的寒空中排著長長的隊伍，高喊著給我麵包的女人及孩童的示威抗議」，⁹³還有僅對「事變」與「出兵」之間的關聯做點到為止的處理、不直接以軍人而是以洋行職員做為主角等書寫策略，未必不是受到當時來自政府的言論箝制與社會氣氛使然。尤其，日本政府在1935年發表了排除有辱「神聖國體」的「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徵聲明」，⁹⁴1938年更通過了包括言論統制等在內的由政府與官僚全面支配日本國民生活的「國家總動員法」，⁹⁵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未能暢所欲言、講真話者所在多有。何銘生在評論曾經出版關於1930年代中國政治與日本帝國主義的著作，為研究中華民國中期歷史最重要的西方學者之一的柯博文（Parks M. Coble）在其近年出版的中國抗日史中的中國戰地記者相關研究著作中便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包括英國和美國，記者也不是完全自由地去報導他們所目睹的事情」、⁹⁶「記者不可避免地

南方出版社。

⁹⁰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40-141 頁。

⁹¹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41 頁。

⁹²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42-145 頁。

⁹³同 24，278 頁。

⁹⁴同 62，143-144 頁。

⁹⁵同 62，160-161 頁。

⁹⁶同 75，157 頁。

首先被要求充當戰時動員人民的工具，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堅持個人的”聲音”？多少和平時期的藝術成了戰時非常時期的犧牲品？」⁹⁷而同樣的質疑也適用於同屬傳播媒介的文學。這一點僅從小說發表的當時，日本的文藝時評中即出現不少關於戰時文學的藝術性與真實性、文學與時代的關係等討論，便可窺知一二。⁹⁸

大鹿卓的戰前文學向來深刻關心越洋前往海外工作的日本人在異鄉的生活實踐，並據此展開其對當局政策之思維。若從西伯利亞出兵及其背景之俄國革命中的核心議題等角度而言，可看出大鹿自三〇年代初至後期在選題與選題與「選角」上的「漸離核心」、「日趨邊緣」。即，作品中的男主角，從隸屬於台灣總督府的日本警察，變成了前往南樺太從事水產罐頭加工業的日本工頭，而到了隨日軍出兵西伯利亞而前往北樺太的洋行的行員的角色，作者已未再聚焦於與國家之間屬於強鍵結關係的角色人物——以〈夜霧〉所描述的故事主軸中的時代背景之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一點而言應為日軍——，而是將主要角色設定為洋行職員這一類雖然也與日軍的戰略行動連動，但相較於軍與國之間的強鍵結關係，其與國家之間乃為弱鍵結關係的男性。而作者也因此得以巧妙地避開日軍在占領地對俄國人施暴的史實這一類較為敏感的議題。職是，就故事主題與殖民地（在本文則為保障占領地）主體的設定的野心及氣勢一點而言，三〇年代末期的〈夜霧〉明顯已比不上三〇年代初期的大鹿卓台灣小說。而這是否意味大鹿卓文學的「轉向」？要回答此問題必須檢討更多作家在該時期前後的作品。然本文能夠指出的是，從發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的大鹿卓的〈夜霧〉已未若作家於三〇年代初期的台灣小說般，在表現方式上直搗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政策的問題之核心，直接處理日軍與俄國女性的男女關係，以及日

⁹⁷同 75，158 頁。

⁹⁸參照岡田三郎、2007 年 10 月、「戦争文学の行方」（初出『北海タイムス』夕刊昭和 14 年 9 月 2 日。參照池內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6 卷昭和 14 年、東京、ゆまに書房、390-391 頁。）；青野季吉、2007 年 10 月、「文学と作家の間」（初出『改造』昭和 14 年 10 月 1 日。參照池內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6 卷昭和 14 年、東京、ゆまに書房、416-422 頁。）；豊島与志雄、2007 年 10 月、「疲れた文学」（初出『読売新聞』昭和 15 年 3 月 1 日。參照池內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 I』第 17 卷昭和 15 年、東京、ゆまに書房、105 頁。）

軍欺凌俄人、出兵失敗等較敏感的歷史議題；且在提出厭戰等訴求時，也是以一種極為隱晦的、不仔細推敲則難以察覺的手法等而言，可看出作家在時代洪流下的書寫策略產生微妙變化的軌跡。

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在主要討論 1931—1945 年這十五年戰爭下的《日本精神史》一書中論及日本思想史上的「轉向」問題時曾指出，三〇年代以後流入日本而廣泛為世人所使用的「轉向」一辭，其「歷史的主要意義是在國家權力下發生的思想變化」。鶴見並進一步指出，此一現象除了國家強制力的作用外，亦源自個人或集團內部的自發性，且「強制力的作用和自發性，對這個現象而言，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層面。依據這種可做記述導引的定義」，後人或可「免於價值判斷，只記述一九三一年到四五年日本所發生的轉向現象。」⁹⁹另外他也強調，「如果我們以負面觀念將『背叛』這個名稱用在一九三一到四五年日本發生的整個轉向現象，我們就失去在謬誤中掏出真理的機會了。」因為轉向研究會有價值，是由於「錯誤中所含的真實比真實中所含的真實對我們更重要」，且「要是能更細心地界說錯誤中的真實，我們對經由錯誤所獲得的真理就有方向感」，而「這才是有實際用處的真理核心」。

100

根據鶴見的轉向論，首先就前述細谷所提到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研究在戰前被視為禁忌一點，以及就作品的核心訴求而言，大鹿卓勇於挑戰禁忌觸及這段歷史，以藉古（出兵）鑑今（日中戰爭）的方式為戰時下的苦難發聲，在噤若寒蟬的時空下，不可不謂有其可貴的一面。然而，鶴見上述論調並非免死金牌，因為小說中呈現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史觀乃具有強烈的鎖國與自我完結性，更可回收到許多論及日中戰爭史的學者都指出的如「國家領導者對日本及其假想敵的軍事力經濟力之差異，一直都提供國民恰與事實相反的訊息，以至於無法防止自己也因這訊息而陷於自欺之局」、¹⁰¹「站在戰爭中的軟實力之觀點，則比起巧妙地聯結起外交、宣傳、言論以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⁹⁹同 88，17 頁。

¹⁰⁰同 88，18 頁。

¹⁰¹同 88，40 頁。

的中國，日本的言論則偏向於只針對國內的，只有日本人才能共有的一種封閉之物」¹⁰²等封閉自欺的知的散播系譜。而「鎖國性常源於國家的孤立」，¹⁰³故由〈夜霧〉中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與日中戰爭（後者同時也是小說書寫的時代背景）這兩個侵略擴張行動都造成了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來看，則小說中顯露的戰時下的鎖國性與自我完結性，也就不足為奇。

7. 結語

本文以日本作家大鹿卓以日本保障占領下的北樺太亞港及北海道為主要舞台的小說〈夜霧〉為對象，探討文本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人的流離之再現，以及小說書寫的時代意涵。作者以深具歷史意涵的城市—亞港為例，呈現出戰前帝國主義下勞力、技術、資本跨界／國流動的現代政經及多民族景觀，並試圖為讀者勾勒出在動盪的國際政情下失所流離者的失／離鄉經驗，以及這群失／離鄉的「命運共同體」所匯集的城市整體之充滿臨時與浮動的意象。其中更是控訴著日本帝國的領土擴張欲望為充滿地政學意涵的城市主體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其次，作者透過日人新井與俄人蕾莎的日俄戀情所暗喻的，其實是俄國革命時，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一段表面上是協助俄國對抗革命軍，實則為趁機擴張勢力的日本對外侵略失敗的歷史。作者正是欲藉由過去的失敗歷史的重提，寓以對當前日中戰爭的省思。

大鹿卓在戰前的小說許多都深刻關心離開日本，前往海外工作的日本人在面臨氣候條件與文化面相等均極為有別於日本時的適應問題，以及這些日本人與異民族之間的互動，還有其如何透過在異地的生活實踐，以切身的體驗思考並呼應帝國的政策等面相。據此，〈夜霧〉可視為前述同一系譜之作品。唯，大鹿卓向來以日人及男性為主體的小說書寫策略，往往令其小說招致在人道主義上的根本懷疑與未脫民族主義框架之評價，就此點而言，寫於太平洋戰爭前夜的〈夜霧〉亦不例外。且儘管小說就其主要旨趣而言是在傳達厭戰思想，作者也展現

¹⁰²同 13，小林英夫前揭書，139 頁。

¹⁰³同 88，23 頁。

出對俄人的人本關懷，而這些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普世價值，但作者並無意關心真正的底層；同時作者也為了形塑先進富強的現代日本之意象而製造出落後待援的傳統俄國的形象，並藉由如是修辭，間接隱蔽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在本質上乃為一擴張侵略的軍事行動之事實。而此種對俄人在性別、種族、階級上的壓迫與優越感，實則貫穿了全文，成為小說在厭戰思想外的另一個鮮明的主張。

日中戰爭爆發後，以日本《讀賣新聞》的特派隨軍記者身份前往上海的小俣行男在他的戰時見聞錄中寫道：「戰爭不但給被侵略的一方，同樣也給侵略一方的官兵們帶來慘痛的災難。」¹⁰⁴本文所探討的小說〈夜霧〉中所再現的日本出兵西伯利亞的史觀，與當時日本國內封閉自欺的知的散播體系系出同門，堪稱是當時日本被國際社會孤立的結果在文學上的體現。若日本在當時的孤立可歸諸於戰爭，則由小說中的史觀所代表的日本人在當時因孤立而導致的自我完結性此一「災難」，則也未嘗不是戰爭下的結果。本文以橫跨兩個日本對外侵略戰爭—西伯利亞出兵與日中戰爭的時代此一資本主義特殊階段中的（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為背景，突顯政治因素下的遷移如何影響著人口組成、經濟與社會結構，並導致新文化的多樣風貌之誕生，同時也帶來各種苦難。就包括政治因素在內的人的流離並非僅只存在於歷史當中，而一直是以現在進行式之姿橫杵在我們面前一點而言，本文當有助於我們對相關議題之思考。另外，向來大鹿卓文學研究多半聚焦於其台灣小說，未來持續透過其北方系列的文學的探討，除了有助於深化吾人對其文學以及對日本帝國文學重層多元的風貌之認識；若立足於台灣，則相關討論也將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吾人對戰前台灣文學的理解。

參考文獻 中文 專書

李永熾譯，鶴見俊輔著，1983年，《日本精神史（1931—1945）》，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林明德著，1993年，《日本史》，台北，三民書局。
周曉萌譯，小俣行男著，1988年，《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太平洋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¹⁰⁴周曉萌譯，小俣行男著，1988年8月，〈序—從日中戰爭到太平洋戰爭〉，《日本隨軍記者見聞錄—太平洋戰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頁。

孫治本譯，伍爾利希·貝克著，2002年，《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夏衍譯，石川達三著，1938年，《未死的兵》，廣州，南方出版社。
敖軍譯，戴維斯著，1998年，《交換》，台北，桂冠圖書。
傅啓學編著，1987年，《中國外交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廖仁義譯，紀登斯著，1995年，《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台北，唐山出版。
上海譯文出版，1999年，《契訶夫文集》第十三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
賴佳楓譯，Stephen Castles, Mark J. Miller 著，2008年，《移民——流離的年代》，台北，五南圖書。

論文

王鉞，1993年，〈俄國和日本對庫頁島的爭奪〉，《民族學報》第二十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何銘生，2016年，〈從希望到失望：戰地記者與國民黨政權——評柯博文著《中國的戰地記者：抗日戰爭的遺產》〉，《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1月號，北京，近代史研究雜誌社。

劉淑如，2016年，〈大鹿卓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與樺太之再現——以〈蕃婦〉與〈福壽草〉為例〉，《政大日本研究》第13號，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劉淑如，2016年，〈田山花袋小說中的殖民地樺太與台灣的再現——以〈阿留夏〉〈真岡〉與〈山中巡查〉為例〉，《高大人文學報》第一期，高雄，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

日文專書

池內輝雄編著，1939年，《『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6卷》，東京、ゆまに書房。

池內輝雄編著，1940年，《『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7卷》，東京、ゆまに書房。

川村湊監修·解說，2001年，《『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 045〔樺太編〕2 大鹿卓著、《大鹿卓作品集》』》，東京、ゆまに書房。

木原直彦著，1994年，《『樺太文學の旅』(上)》，札幌、共同文化社。

木原直彦著，1994年，《『樺太文學の旅』(下)》，札幌、共同文化社。

金星堂編著，1930年，《『日本現代詩研究』》，東京、金星堂。

小林英夫著，2007年，《『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消耗戦へ』》，東京、講談社。

志賀重富編，1928年，《『志賀重富全集』第五卷、《大役小志》》，東京、志賀重富全集刊行會。

島田謹二著，1995年，《『華麗島文學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東京、明治書院。

高橋治著，1973年，《『派兵』第二部「シベリアの虹」》，東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朝日新聞社。

高橋治著，1977年，《『派兵』第四部「凍土の孤影」》，東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朝日新聞社。

鶴見俊輔·久野収著，1998年，《『現代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德田耕一著，2004年，《『サハリン』》，東京、るるぶ。

中山大將著，2014年，《『亞寒帯植民地樺太の移民社会形成——周縁的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植民地イデオロギー』》，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細谷千博著，1955年，《『シベリア出兵の史的研究』》，東京、有斐閣。

由井正臣著，2000年，《『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

論文·記事

青野季吉，2007年，「文学と作家の間」、池内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6卷 昭和14年》，東京、ゆまに書房。

宇野浩二，「新春新人観(1)」、《『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7卷》，東京、ゆまに書房。

字月俊幸，1993年，「明治初年の樺太——日口雜居をめぐる諸問題——」，《『スラヴ研究』40号》，札幌、北海道大学スラブ研究センター。

淺田江村，1919年，「時局の印象——西伯利増兵問題」，《『太陽』第26卷第1號》，東京、博文館。

岡田三郎，2007年，「戦争文学の行方」、池内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6卷 昭和14年》，東京、ゆまに書房。

菊地昌典，1974年，「ロシア革命と日本」，《『総合講座 日本の社会文化史』第七卷「世界の中の日本」》，東京、講談社。

傳寶樸津，1920年，「好戦と忘戦」，《『太陽』》，東京、博文館。

豊島与志雄，2007年，「作者の眸と夢」、池内輝雄編著，《『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6卷 昭和14年》，東京、ゆまに書房。

豊島与志雄，2007年，「疲れた文学」，《『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7卷 昭和15年》，東京、ゆまに書房。

原暉之，2011年，「ロシア革命とシベリア出兵」，《『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4卷「社会主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 1920年代」》，東京、岩波書店。

古谷綱武，2007年，「人間性の問題」，《『文藝時評大系 昭和篇Ⅰ』第16卷 昭和14年》，東京、ゆまに書房。

某露国通，1912年，「露国過激派統治の内容」，《『太陽』第25卷第3号》，東京、博文館。

附記：由衷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的寶貴的意見，未盡完善處，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探討台灣「日本文化」課程的教育動向與課題 — 尋求日語教育及日本研究及通識教育的銜接點 —

羅素娟

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台灣「日本文化」課程的教育動向，尋求日語教育及日本研究及通識教育三者的銜接點，以闡明「日本文化」課程未來的教育課題。

綜觀從 1895 年至今，台日兩地日語教育中「日本文化」教育的發展歷史發現：「2000 年之前，台灣日語教育的發展多半隨著日本國內的日語教育的腳步發展。2000 年至今，為了尋求適合新時代的教育內容，台灣與日本面對共同全球化議題，正各自發展對策。」在台灣大學教育中，第二外國語日文教育是多半屬於通識教育的一環，通識教育與第二外語日語教育發展關係密切。1995 年開始台灣教育部為求通識課程質的提升，持續推動通識課程計畫，以筆者四次計畫的課程設計實踐成果來看：「多元的課程設計確實可以獲得較深入的學習，促使「日本文化」課程更具發展性。」由於日語教育及日本研究及通識教育三者互為互補關係。因此，未來如何透過設計巧妙整合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學問，將成為重要的教育新課題。

關鍵字：知識整合、日本文化、通識教育、日本語教育、日本研究

受理日期：2017.03.10

通過日期：2017.05.05

A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al Tendency and Issues about “Japanese Cultures” Courses in Taiwan: Looking for the Link among Japanese Education, Japanese Research, and General Education

Lo Su-Chu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wan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educational tendency about “Japanese cultures” courses in Taiwan and therefore seeks the link among Japanese education, Japanese research,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elaborate future educational issues on “Japanese cultures” courses.

It is found that before 2000, the Japanese education in Taiwan follo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education in Japan. However, after 2000, in order to seek appropriate education echoing with the new age, Taiwan and Japan, faced with mutual globalization, respectively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tegies. From 1995,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tivated programs on general educa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gene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our-time practice of the course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s, it is proved that multiple course designs can stimulate deeper learning and urge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ultures” education. Since Japanese education, Japanese research, and general education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how to cleverly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in these three fields will be a new and important educational issu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knowledge integration, Japanese cultures, general
education, Japanese education, Japanese research